宗教艺术

论清代国师章嘉·若必多吉的政治活动

秦永章

[摘要] 本文根据藏汉文资料对清代大国师章嘉·若必多吉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教生涯中，以一方藏传佛教领袖的身份，奔波于大漠南北、雪域高原，参与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清代前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清代；国师；章嘉·若必多吉

[中图分类号] K281/2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00）03－0077－09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Imperial Tutor, Zhangjia Ruobiduoji,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utilizes a wide arra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present a detailed and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Zhangjia Ruobiduoji, an imperial tutor in the Qing dynasty. As a political and Tibetan Buddhist leader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Zhangjia contributed to resolving many diverse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He made positive and worthwhil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inforc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 united and multinational China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article also addresses inaccurate scholarly criticisms of Zhangjia Ruobiduoji.

有清一代，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是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蒙藏民族及蒙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许多上层人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动往往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备受清廷尊崇的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之一，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相提并论，分管京城及漠南蒙古地区宗教事务的章嘉活佛就是他们中相当突出的一个典型，尤其是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8 岁进京至 70 岁时圆寂，在宫廷任职 60 余年，经历了雍正、乾隆两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宗教、政治生涯中，不仅受命广译佛经，兴建寺院，在宗教、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以佛教高僧的身份，奔波于大漠南北、雪域高原，参与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鉴于此，本文拟就清代国师章嘉·若必多吉的政治活动做一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章嘉活佛原系青海佑宁寺的五大活佛系统（即章嘉、土观、松巴、却藏、王嘉）之一。佑宁寺原称“郭隆寺”，位于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乡境内，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格鲁派在青海地区修建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寺院之一。到清康熙年间，该寺有大小经堂、僧舍、昂欠（即活佛府邸）等 2000 多个院落，僧侣达 7000 余人，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四大学院。郭隆寺属寺众多，被誉称为

[收稿日期] 2000—03—15
[作者简介] 秦永章（196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1

“湟北诸寺之母”。雍正二年（1724），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中，郭隆寺被清军焚毁。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敕令重建，赐额“佑宁寺”。

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降生在甘肃凉州（今武威）莲花寺附近的一个土族牧民家庭，父名古茹丹增，是一名部落咒师，母亲名叫布吉，是一名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他3岁时被认定为前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1642—1715）[①]的转世灵童，于次年迎至青海佑宁寺坐床，开始学习藏文读写和佛典。雍正元年（1723），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佑宁寺毁于兵燹。雍正帝恐三世章嘉在乱军中受害，急诏清军统帅年羹尧寻找三世章嘉，保证其安全，派人将他送至京师。次年，三世章嘉被清军护送至北京，驻锡弘仁寺。不久，雍正帝躬身亲问，一见如故，执手并坐，想起前辈章嘉，不觉潸然泪下。以后，雍正帝还对年羹尧说：“你将青海蒙古全部收归治下，朕并不怎么高兴，而你把朕之喇嘛的真正转世延请至京，与朕会面，却使朕高兴之至”[②]。

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雍正帝命章嘉移驻嵩竹寺，举行坐床典礼。在通往嵩竹寺的道路上，“地铺黄毡，赏乘黄车、九龙褥及各种珍品，遣官护送，僧众载道”[③]。雍正帝为了把三世章嘉培养成像其前世那样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宗教领袖，加强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与清廷的关系，不仅让他跟随当时京师的掌印喇嘛二世土观呼图克图学习佛教经典，并且让他与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一同读书多年。每当夏日气候炎热时，雍正帝将三世章嘉和二世土观召至皇家园林内居住，研讨佛法，任其游览。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发银十万两，仿西藏达赖喇嘛所居经楼，在多伦诺尔兴建善因寺，赐给三世章嘉活佛驻锡主持，“集会喇嘛，讲习经典，广行妙法”[④]。三世章嘉经过十年苦读，不仅通晓显密经论，掌握了汉满蒙藏等文字，并且与皇四子自幼相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他以后的政教建树创造了条件。

雍正十二年（1734），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袭“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号，并赐给金印、金册。从此，章嘉国师经常被召至宫中，与雍正帝商谈政教大事，并开始了他杰出的宗教、政治生涯。

一、赴泰宁护送七世达赖返藏

章嘉国师第一次参与清廷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他奉雍正帝谕旨偕同果亲王允礼，前往泰宁迎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这是清中央政府与西藏藏传佛教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章嘉国师首次以漠南蒙古藏传佛教领袖的身份行使清政府交给的政治使命。

章嘉国师的泰宁之行，与当时西藏地区政局变化、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凌侵扰西藏、达赖喇嘛移住泰宁有密切关系。雍正六年（1728），西藏阿尔布巴事件被平定以后，清廷为了防止准噶尔部乘机袭击，危及达赖喇嘛的安全，于是派藏兵两千名，护送达赖喇嘛到理塘“暂住防护”，又遣副都统鼐格前往迎接驻扎照管。达赖喇嘛由拉萨抵达理塘后，又移住泰宁噶达的惠远庙，由清军悉心守护。

雍正十二年（1734）七月，雍正帝降旨云：“从前令达赖喇嘛移驻泰宁，原因彼时藏中有阿尔布巴等事，恐准噶尔逆贼乘间来犯，是以令其移至近边地方，以便照看。其随来之弟子人等，久离乡土，未免怀归。今贝勒颇罗鼐实心效力，将唐古特、厄鲁特之兵操练精熟，各处紧要隘口，俱已严固防守，藏中晏然无事。班禅额尔德尼年迈有疾，应令达赖喇嘛回藏”[⑤]。

为了扩大章嘉国师在西藏的影响，联络西藏上层集团的领袖人物，了解西藏僧俗上层集团内部的情况，以便采取治藏对策，加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的关系，雍正帝特命章嘉国师偕同果亲王允礼前往泰宁，迎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并允准在西藏停留稍长时间。章嘉一行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泰宁，向达赖喇嘛宣读谕旨，颁给赏赐。七世达赖对章嘉国师特别器重，朝夕相处，终日晤谈不止。[⑥]次年七月二十四日，七世达赖被送至布达拉宫坐床。此后，章嘉国师在拉萨三

大寺讲经说法，声誉大振，僧人们争先饮用章嘉活佛洗过手的水，取下帽子为他铺路，以为有福和崇敬。[7]

章嘉国师在西藏期间，不仅与七世达赖过从甚密，而且与五世班禅也建立了密切的友谊。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章嘉国师抵扎什伦布寺，拜谒了年迈的五世班禅，奉献了金质曼扎、佛经、佛像、佛塔、金银及其他礼品，并聆听教法。五世班禅打算把自己掌握的佛法全部传授给章嘉国师，但是，不久因雍正帝驾崩，章嘉国师不得不匆匆返回拉萨。临别时，五世班禅设宴饯别，赠送礼物，并“谆谆教诲章嘉活佛以他精湛的才识和高尚的德行在所有的地方，特别是在汉地为大皇帝的政教事业尽力，成为教法和众生的至高无上的怙主”[8]。次年初，章嘉国师在拉萨与达赖喇嘛等依依惜别，返回京城。

七世达赖由泰宁返藏后，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圆寂，二十年间一直在西藏地区“勤衍黄教”，这在政教方面既稳定了西藏地方局势，又有利于清政府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乾隆十五年（1750），颇罗鼐死后，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七世达赖喇嘛之所以迅速擒获其逆党，安抚难民，稳定了西藏的局势，正是西藏地方和清中央政府良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由于章嘉国师在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及在西藏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西藏的僧俗各界人士，与达赖、班禅两位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扩大了他在佛法圣地西藏的政教影响。他在西藏获知的政教等各方面的情况，无疑为他以后参与处理西藏的民族宗教等事务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章嘉国师出色地完成了清廷交给他的迎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的政治使命，博得了清政府的极大信任。此后，在蒙藏地区凡有重大问题，清政府均以章嘉国师为特使前往处理。

二、直谏乾隆取消在西藏设省

乾隆元年（1736）初，章嘉国师抵京后，立即拜见了新登基的乾隆皇帝。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藏传佛教对蒙藏地区所起的作用，尽力从宗教上联络蒙藏宗教上层，对自幼相知、有同窗之谊的章嘉国师更是恩宠有加。章嘉国师不仅依照其前世之例，可以使用御用的金龙黄伞、九龙褥、黄幢车，而且章嘉活佛的黄幢车，可以破例直接驶入东华门。同年十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掌管京师喇嘛事务的大印交给章嘉国师，封他为掌印喇嘛。此后，乾隆帝还经常登门拜访章嘉活佛，或谈国事，或叙友谊，或论佛法。有时免除繁缛礼节，他们手拉着手，显得特别亲切。乾隆帝还拜章嘉活佛为上师，听受显密教法，甚至“跪在地上，顶礼章嘉国师之脚”[9]。

由于章嘉国师对蒙藏地区政教上层人物的实际状况和心理活动有深刻的了解，又常居京城，对清朝处理蒙藏事务的方针政策也十分熟悉，因此，他经常被邀参加清廷处理蒙藏地区的政治事务，而且能提出符合蒙藏地区实际情况的合理建议，被乾隆皇帝采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章嘉国师直谏乾隆、取消欲在西藏设置行省之事。

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西藏发生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权势过重、狂虐日甚的已故郡王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执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党羽罗桑扎西等又聚众数千，进攻衙署，傅清身受重伤，以自尽效忠朝廷；拉布敦斩敌数十人，身受重伤，最后也力竭被害。[10]一向倚任“藏王”的乾隆皇帝闻报后，震怒之下，认为此乱是对藏人加恩过重造成的，今后，对于藏人不可授予权柄，还欲把西藏改为一个由流官统治的行省。乾隆帝对章嘉国师说：“我想，应在拉萨建一汉式大城，设置一员管理藏民的总督和一员提督，率兵一万驻扎，并委派征收税赋和审理诉讼的道官、知府、知县等官员，西藏的一切大小事务均由汉官处理”[11]。章嘉活佛面对乾隆帝对西藏准备采取与内地一样的统治方法，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做与西藏的民族、宗教等实际情况不相适合，这不仅会直接损害西藏上层集团尤其是达赖喇嘛的既得利益，而且影响清廷对西藏的稳定统治。于是，章嘉活佛以保护佛教为由，犯颜直谏，对乾隆皇帝恳求说：“陛下之父祖先帝竭力尊崇佛教，尤其陛下是关心佛法事务的大法王。西藏乃教法之发源地，如果按圣上所下的旨令，藏地的

佛教必将衰微，万望陛下无论如何以恩德护持佛教。”章嘉活佛“像钉在地上的木桩一样，长跪不起”⑫。

乾隆皇帝听了章嘉国师的话以后，觉得“确有道理”，思之再三，决定收回成命。不久乾隆帝对章嘉国师说：“西藏乃佛教发源地，因此，朕对此事不敢率尔，思量再三，想与你仔细商议。朕想把西藏的政教权力从现在起交给达赖喇嘛，这样或许对黄教和社稷都有好处。这样做，你以为如何?”章嘉国师对乾隆帝的明智决策连连称赞说：“感谢陛下大恩”⑬。

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乾隆帝以“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伦不致擅权”作为办理藏事的三条基本原则，批准了四川总督策楞等呈奏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废除了“藏王”（郡王）世袭旧制，将西藏的政教权交给七世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事务，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地区的政教领袖地位。这一措施避免了清朝对藏政策上的失误，有效地抑制了西藏世俗贵族把持藏政的弊端，增强了清廷在西藏实行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的统治，更加稳定了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僧俗领袖的统属关系，同时对西藏的发展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再赴西藏主持认定八世达赖

乾隆二十二年（1757），章嘉国师入藏主持认定八世达赖喇嘛。当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七世达赖圆寂后，西藏由谁为首执掌，关系十分重大，乾隆帝对此十分重视。二月二十七日，经过反复认真的考虑后，乾隆帝决定让德高望重的章嘉国师赴藏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乾隆帝在给军机处的一封谕旨中云：“前此伍弥泰等奏到达赖喇嘛圆寂，朕念卫藏地方紧要，曾于折内批谕遣章嘉呼图克图前往。此特因卫藏不可无为首办事之人，原系抚恤伊等之意”⑭。

正当乾隆帝降旨让章嘉国师进藏办事的同时，收到了驻藏大臣伍弥泰和萨拉善遂西藏僧俗民众之愿，令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札木尔德勒克嘉木措办理喇嘛事务的奏折，乾隆帝经过慎重考虑后，遂应西藏僧俗之请，决定让第穆呼图克图代达赖喇嘛掌管黄教事务，并赐给“掌管黄教吉祥诺门汗”的名号，同时传谕章嘉国师停止入藏。

章嘉国师刚接到命其入藏的上谕不久，又接到停其入藏的上谕，觉得自己虽然不能亲赴西藏处理政教事务，但有必要把自己对西藏僧俗事务的看法告诉乾隆帝，遂于三月十七日，用满文拟写了一封长篇奏折，陈述了他自己对西藏事务的意见，提出藏地的一切事务应由第穆呼图克图为首办理，不得让噶布伦擅权。提醒乾隆在噶布伦等人的奏折内有“仅将喇嘛事务交第穆呼图克图办理”之语，所言“并不明白，似稍有含糊”⑮，如果乾隆帝批准这种含混之请，仅将喇嘛事务让第穆呼图克图办理，就意味着喇嘛事务以外的一切事务要由噶布伦办理，将来必有噶布伦擅权的危险。乾隆帝最后采纳了章嘉国师的建议，朱批云：“呼图克图之思甚是，阅之颇悦。除照此降旨第穆呼图克图外，亦秘密降旨驻藏大臣”⑯。

乾隆帝虽然降旨任命第穆呼图克图为西藏地方政府摄政，巧妙地填补了七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噶厦政府中出现的权力真空，但对西藏的事务一直放心不下，尤其对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之事更是关心。因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确定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着当时及将来西藏的稳定。有鉴于此，乾隆帝最后还是决定让章嘉国师进藏办事，降旨云：“达赖喇嘛乃是西藏佛教的唯一栋梁，近不幸逝世，虽十分不幸，亦无可奈何。现在确认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至关重要。章嘉呼图克图须去西藏，寻访认定其转世。朕虽不愿遣呼图克图去远方，然此次之事关系西藏佛教大业，甚为重要。你去后不必久留，一经认定转世灵童，即可返回”⑰。

章嘉国师接到又让他进藏的圣旨后，在一名大臣和两名御医的陪同下，于当年十二月抵达拉萨，刚刚奏准开始代理达赖喇嘛职权的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驻藏大臣伍弥泰和官保以及政府噶伦、三大寺的活佛、堪布等出城欢迎，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章嘉活佛在拉萨与僧俗各界广泛接触，尤其对掌办西藏喇嘛事务

的第穆呼图克图特别尊重。他发现刚刚出任摄政不久的第穆呼图克图由于从西藏工布地区的一个普通活佛，骤登摄政的高位，不太受人尊敬。《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这样记载道："先前，达赖喇嘛去世后，大皇帝按照噶厦的奏请，乃命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代理达赖喇嘛的职权。但是不为藏人所敬重，举行宴会时座位次于两位驻藏大臣，被安排在一个低小的座位上。章嘉国师认为他是达赖喇嘛的摄政，藏人们的门面，首次会面时就下马执手，互相交换哈达。从此，第穆活佛地位日高，大小事体，均如噶丹颇章政权之例规"[18]。章嘉国师按照乾隆帝的旨意，以钦差的身份，在大庭广众之中对第穆呼图克图表示了极度尊敬，这对西藏的噶伦等是一个极其明显的暗示，即清政府对第穆呼图克图的支持和重视。章嘉国师的这一做法，提高了第穆呼图克图的地位，对安定当时西藏的局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当时有三名待认定的转世灵童出现在东、南、西三个方向，护法神降神时，桑耶寺的护法抢先指认前藏出生的灵童是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其他护法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章嘉国师认识到六世班禅大师在认定达赖转世灵童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他才能排除灵童确认过程中的阻力。于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月，在西藏僧俗官员的陪同下，亲赴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会见班禅大师，商讨有关认定达赖转世灵童之事。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章嘉国师将六世班禅迎请到拉萨，建议由他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章嘉活佛对大家说：诸护法降神，各不相同，"现在我们大家只好一起请求班禅大师，无论他作何指示，我们都应该相信才是"[19]。对章嘉活佛的建议，人们都表示赞成。于是，"班禅大师以他超绝的智慧，降示了后藏所出的那个孩童是三界怙主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的预言"[20]。这样，与六世班禅有亲戚关系的这位后藏托卜嘉地方出生的孩童则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即八世达赖喇嘛坚白嘉措。八世达赖喇嘛被六世班禅指认以后，章嘉国师作为乾隆皇帝的代表，自始至终主持了全部认定过程，并上奏皇帝，由乾隆批准承认。这是乾隆皇帝后来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的先声。另外，章嘉国师参加了为七世达赖喇嘛的灵塔举行的开光仪式，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离开拉萨返回北京。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七月，在六世班禅和章嘉国师的努力下，八世达赖喇嘛在拉萨被认定并举行了坐床仪式。但是，直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藏格仓静修寺的喇嘛扎德格西仍认为前藏出生的灵童是七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将灵童迎至本寺，以致许多人认为这个灵童才是真正的八世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将此事奏报后，乾隆帝大怒，下令将扎德格西喇嘛和灵童押至北京治罪。章嘉国师深知认定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以压制或杀戮的办法不仅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给以后种下事端，因此，他向乾隆皇帝进谏道："这样做对佛教不利，不如将那个灵童送往后藏扎什伦布寺，让他做班禅大师的侍从，不仅对眼下有利，事情也会如泉水自干。对达赖喇嘛的事业也不会带来妨碍"[21]。章嘉国师的这一建议，被乾隆帝欣然采纳，传谕驻藏大臣依此办理，赦免了扎德格西和灵童的死罪，平息了一场风波。同样，在喀尔喀也有一名喇嘛宣称自己的侄子是二世哲布尊丹巴的真正转世，其他人也附和讹传，对此乾隆帝也采纳了章嘉国师的建议，将其移至热河居住。[22]

章嘉国师这次奉旨出使西藏，不仅肩负着寻访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重大使命，同时还有督导驻藏大臣工作的特殊任务。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西域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木布拉呢敦和霍集占兄弟，拥兵自立，发动叛乱。清军压境后，谋奔巴达克山。当时，驻藏大臣伍弥泰和官保不察详情，既不考虑路程遥远，又不想到自己能否办理，争欲带兵前往藏北阿里地区，准备在霍集占逃到拉达克（今克什米尔地区）后前去擒拿。章嘉国师从稳定西藏的大局出发，"以藏内人多疑，恐因此妄造语言，于事无补"为由，竭力劝阻，并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将此情况上奏给乾隆皇帝。乾隆帝当即降旨称赞章嘉国师，斥责伍弥泰和官保"殊属糊涂，且复取巧。呼图克图阻止伊等甚是。伍

弥泰、官保著传旨严行申饬”[23]。次年正月，章嘉国师又将从西藏派往拉达克刺探情报的人了解的情况上奏给乾隆皇帝，同时对拉达克汗王进行安慰，也请乾隆帝降谕旨给正在征讨霍集占的清军统帅兆惠，对拉达克汗王“加以体恤”[24]。无疑，章嘉国师从西藏的具体情况出发，劝阻驻藏大臣伍弥泰等出兵阿里，对维护西藏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总之，章嘉国师这次奉乾隆帝谕旨出使西藏，在西藏停留了近三年的时间。此间，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乾隆帝交给的寻访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使命，提高和巩固了第穆呼图克图在西藏的摄政地位，同时对清廷派出的驻藏大臣的工作进行督察等，这对保持西藏地区的稳定以及强化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还有，章嘉国师在这次出使西藏的过程中，就西藏的政教事务多次与六世班禅会晤相谈，并给六世班禅传授教法，二人之间相互尊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隔十几年以后，六世班禅大师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波格尔谈到自己与章嘉国师的私交时说：“比起章嘉呼图克图来，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因为他一直在皇帝身边，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皇帝赐给我和达赖喇嘛的恩典，大部分是由于章嘉喇嘛在朝廷里帮了忙”[25]。以后，六世班禅顺利入觐朝见乾隆帝，不能不说这与他和章嘉国师亲密的友谊不无关系。

四、自始至终参与了六世班禅朝觐乾隆帝的过程

乾隆年间，在著名的六世班禅朝觐过程中，章嘉国师自始至终参与其间，发挥了相当特殊的作用，这不仅是章嘉国师一生政教生涯中影响很大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是清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政治事件。

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章嘉国师第二次赴藏主持认定八世达赖喇嘛时，曾专程前往后藏扎什伦布寺，面谒六世班禅，转达了乾隆帝邀请他进京朝见的旨意，班禅当即答应在适当的时候进京陛见。章嘉国师返回北京后，向乾隆帝汇报了他在西藏三年多的活动情况，并转达了六世班禅对乾隆帝的敬仰之情和愿意赴京陛见之事。从此，乾隆帝将班禅朝觐一事提上议事日程，并邀请班禅在自己的七十寿诞之际入觐。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二月，六世班禅接受乾隆帝的邀请，作出前往北京参加乾隆帝七十大寿庆典的决定后，及时通知了章嘉国师，并请他转奏给乾隆皇帝。于是，“昨据章嘉呼图克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朕本欲见班禅额尔德尼，因道路遥远，或身子尚生，不便令其远涉，今既出于本愿，实属吉祥之事，已允所请。是年朕万寿月，即驻热河，外藩毕集，班禅额尔德尼若于彼时到热河，最为便益，已谕令于热河度地建庙，备其居住。至沿途应办事宜尚多，均系理藩院承办，虽为日尚宽，而早为部署，更觉从容妥当”[26]。为了接待六世班禅，乾隆皇帝下令在热河仿照扎什伦布寺兴建了宏伟的须弥福寿庙，届时以供班禅居住。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禅率领西藏僧俗人员两千余人，由扎什伦布寺起驾，风尘仆仆，踏上了朝觐东行之路。从此，乾隆帝对班禅东行一事更加关心，经常过问有关班禅的具体事务，作为六世班禅与乾隆皇帝的特殊使者的章嘉国师也便忙碌起来。

同年八月，六世班禅致信章嘉国师，当时章嘉国师正在五台山避暑，于是乾隆帝下令“务须将该文书由驿发往五台山，章嘉呼图克图阅毕后回文”，并寄信章嘉国师“将班禅额尔德尼之唐古特文译成清字具奏，朕欲知其内情”[27]。同月，乾隆帝赏赐给六世班禅和章嘉国师“亮轿”各一乘[28]。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六世班禅一行自青海塔尔寺起程前往热河，五月二十六日抵达岱汉寺（今内蒙古凉城县境内），乾隆帝已派章嘉国师和皇六子永瑢到此迎接。章嘉国师和皇六子给六世班禅颁赐了乾隆帝的诏书和赏赐物品，并设大宴饯之。久别后的六世班禅和章嘉国师，晤谈良久。此后，章嘉国师先行回到多伦诺尔迎候。六月二十日，班禅一行抵达多伦诺尔，章嘉国师率僧俗官员两千余人，迎六世班禅至汇宗寺附近的行辕安禅，并设盛宴接风。六月二十六日，章嘉国师和皇六子奉旨又先行赶赴热

河，向乾隆帝报告六世班禅在途中的情况。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抵热河避暑山庄，章嘉活佛与朝臣们一起出迎，与六世班禅一起朝见乾隆帝。接着章嘉国师又陪同班禅大师至避暑山庄各处巡礼，并在特为六世班禅修造的须弥福寿寺饮茶畅谈。次日，乾隆帝驾临须弥福寿寺看望六世班禅，并用藏语表示问候，乾隆帝还说："在朕七十寿辰庆典之际，班禅额尔德尼佛驾光临，对此方生灵大为有利。朕多年来虽从章嘉呼图克图学习若干佛法，然而佛法无边，深似苍海，朕须料理全部国事，不得闲暇，未能参究呼图克图所授佛法，只是时常勉力而已……朕以前不会说藏语，为了你的到来，朕赶紧向呼图克图努力学习了日常用语，但是不够熟练，有关教法的词语，可请章嘉呼图克图担任翻译"[29]。乾隆帝与六世班禅的会晤愉快地结束后，章嘉国师对班禅说："大皇帝对你崇信备至，喜悦万分，老夫我与皇上相处以来，从未见他如此高兴过"[30]。在随后的日子里，班禅大师所到之处，章嘉国师都要亲自陪同。"当时，大皇帝特许班禅大师乘轿至寝殿内，章嘉国师也坐轿至寝殿门外，给予了无上的礼遇"[31]。八月初七日，为乾隆帝七十大寿，六世班禅随同高丽国使臣以及蒙藏各地王公、满汉大臣，给乾隆帝献礼祝寿。六世班禅致祝寿辞，乾隆帝致答辞，都由章嘉国师逐句翻译。祝寿活动结束后，章嘉活佛先回北京，于九月初一日六世班禅到达北京时在郊外迎接。随后，章嘉国师陪同班禅在北京的寺院和名胜巡礼。十月初三日，乾隆帝在紫禁城太和殿会见并宴请六世班禅，特许六世班禅乘轿至殿前第三层台阶，章嘉国师乘轿至第二层台阶。此后，章嘉国师又陪六世班禅在旃檀觉卧寺、雍和宫、嵩竹寺举行法事活动，并给乾隆帝讲经说法，由章嘉国师担任翻译。十月二十八日，六世班禅身染重病，即请章嘉国师及御医诊脉治疗，断为天花。十一月初一日，六世班禅在西黄寺圆寂，享年 43 岁。

班禅大师圆寂后，章嘉国师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治丧事务中。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仅初三日一天，章嘉国师所办的事务就有：将先前班禅额尔德尼在宁寿宫念经时让他转呈给乾隆帝的俐玛佛、念经铃杵等物进呈给乾隆帝；皇六子和福隆安，遵照乾隆帝的旨意，"会同章嘉呼图克图商酌，兹照班禅额尔德尼体高备棺一副，安放班禅额尔德尼遗体，装入金塔，其外造带帷大柜，置金塔于柜，安放百日念经"；又因金塔不能马上造成，于是，"福隆安与章嘉呼图克图相商，先造一木龛，初次超度毕，暂行供于龛内，俟塔成再请入塔中"；因给班禅制造金塔之需，章嘉呼图克图将一座铜镀小金塔呈览给乾隆帝，乾隆随降旨照铜塔样式放大制造；造办处大臣舒文面奉谕旨，"问章嘉呼图克图，（金塔）塔欢门内应供何佛像。据章嘉呼图克图说，或供梵王太子佛，或供班禅本尊像俱可。随画得梵王太子佛纸样一张呈览"；当晚，章嘉国师留黄寺"受管查看所有物件，守护一夜"等。[32]此后，有关班禅大师的治丧工作中的所有具体事务，清朝官员均与章嘉国师商量后，共同负责处理。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二日，六世班禅的灵塔被送往西藏，章嘉国师一直送到清化府地方后，凄凄而返。

由上可知，在六世班禅朝觐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章嘉国师不辞辛劳，自始至终充当了班禅与乾隆帝之间的特殊信使、高级翻译，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同时，章嘉国师是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他不仅去远迎六世班禅，安排六世班禅的衣食住行，一直奉旨陪同，而且有关此行的重要事务都由他酌定，连六世班禅朝见乾隆帝时双方的陪同人员、入宴人数及坐次等具体事务也由他确定。班禅圆寂后，章嘉国师又积极筹办丧事，协助制造金塔等。总之，章嘉国师在这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伟大的贡献。

五、规劝平息喀尔喀蒙古叛乱

由于章嘉国师是主管内蒙古地区佛教事务的宗教领袖，他在蒙古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清政府也经常利用章嘉国师的这种影响，来维护和巩固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乾隆二十一年（1756），利用章嘉国师规劝哲布尊丹巴、平息喀尔喀蒙古的叛乱即为一例。乾隆二十一年春，正当清朝为平定准噶尔上层

分子阿睦尔撒纳之乱在新疆用兵紧急之时，因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纵放阿睦尔撒纳逃脱，被乾隆帝赐死，这引起了其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个别蒙古王公的不满，他们认为“元太祖裔从无正法者”[33]，于是诸部蠢动，图谋反清。次年五月，喀尔喀郡王青滚杂卜乘机发动“撤驿之变”，由内地通往新疆的第十六至二十九驿站，全部撤毁，使清王朝北路军台道路隔绝，羽书中断，并煽动守护驿站的喀尔喀官兵私自逃跑，四处掳掠。这无疑对清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它延缓了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进程，影响了清王朝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据清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记载，当时，章嘉国师正扈从乾隆皇帝于木兰围场，乾隆帝接到青滚杂卜撤驿叛乱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和忧虑，并将此事告诉了章嘉国师。章嘉国师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之后，满有把握地对乾隆帝说：“皇上勿虑，老僧请折简以消逆谋”[34]。于是，章嘉国师连夜起草了一封书信，派自己善于游说的一位姓白的侍从火速送递给二世哲布尊丹巴。信中云：“国家抚绥外藩，恩为至厚。近额（即额淋沁多尔济）自作不轨，故上不得已施之以法。乃视蒙古与内臣无异之故，非以此尽疑外藩有异心也。如云元裔即不宜诛，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况吾侪方外之人，久已弃骨肉于膜外，安可妄动嗔相，预人家国事也？”[35]送信的侍从“日驰数百里，旬日始达其境”，哲布尊丹巴正“整师刻日起事”[36]。

正坐在“胡床”上的哲布尊丹巴听说章嘉活佛派人来，知道是来做说客的，命令兵丁手执刀枪，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让姓白的喇嘛“匍匐而入”。章嘉国师的这位侍从，并未被眼前森严的气氛所吓倒，相反，以他出色的口才，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及其利害关系。哲布尊丹巴被说服，又读了章嘉国师分析精辟透彻的书信以后，听从劝导，决定不再起事，并礼遇使者，让他回去复命，命诸部首领罢兵。

关于以上这一事件，三世土观活佛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作了如下的记述，云：“此时，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之兄达尔汗亲王，因触犯大皇帝的法规，准备器械，准备整个喀尔喀行将叛乱。大皇帝对章嘉国师说：‘你应当迅速去与喀尔喀谈判。’遵照皇帝的指示，章嘉国师在准备前往之时，给哲布尊丹巴写了一封信，陈述绝对不能作乱的原因，派遣侍从南杰坚星夜火速送去。哲布尊丹巴听从章嘉国师的劝导，晓谕喀尔喀的所有首领，不能违背大皇帝之意旨。喀尔喀人众遂告平定。章嘉国师从多伦诺尔前进了数日路程，得到哲布尊丹巴已安定了局势的回信，便向皇帝报告了情况，皇上于是降旨：‘既然如此，国师不必前往，可以回宫。’于是，章嘉国师返回朝廷，朝见皇帝。皇帝十分欣喜地说：‘一旦发生人数如此众多规模颇大的叛乱，许多年中定有无数生灵涂炭。一纸书信，其乱自平。尊胜上师你真是饶益众生的法力无穷的大德’”[37]。

章嘉国师派遣的侍从南杰坚与《啸亭杂录》中所记的“善游说”的“白姓”侍者可能是同一人。

《东华录》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戊午条有如下一条记载：“命章嘉呼图克图同内扎萨克王公，赴鄂尔坤、塔密尔，会同哲布尊丹巴及喀尔喀王公会盟，协擒青滚札布，毋得擅弃卡座台站”[38]。这条记载印证了上引章嘉国师传中对这一事件记载的真实性，可知“撤驿之变”发生后，乾隆帝曾命章嘉国师出使喀尔喀会同哲布尊丹巴活佛等人会盟，要求胁擒青滚杂卜。章嘉国师赴喀尔喀途中，得知哲布尊丹巴已听从劝导，又令诸部罢兵的消息后，奏准乾隆皇帝折途返回北京。

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清政府抓住有利战机，派出了一支军队，追捕青滚杂卜，终于将他擒获，解至北京处死。至此，持续九个月的撤驿之变遂告结束，喀尔喀地区一场可能造成民族分裂的萌动中的动乱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这对于保证清朝统一新疆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反映出章嘉国师在喀尔喀蒙古中举足轻重的影响。

综上所述，清代国师章嘉若必多吉利用其一方藏传佛教领袖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长期奔波于京师和蒙藏地区，参与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做出了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他们的这种传统被以后的历世章嘉活佛所继承和

发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将永垂史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个别学者对章嘉国师的政治活动颇有微词，如台湾学者札奇斯钦在其大著《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中，指责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多处写到“历世的章嘉大师自始至终多是充满政治色彩的”，“章嘉一系的呼图克图们，多半是从事于政治的喇嘛”，“章嘉呼图克图从一世到末世都是受清廷利用作爪牙的喇嘛”等。诚然，从事政治活动是章嘉活佛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历世章嘉活佛毕竟是一方的藏传佛教领袖，从他们的事迹看，宗教活动仍是他们最主要的活动。评价清代宗教上层参与的政治活动，必然要涉及清廷的藏传佛教政策，笔者在这里无意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讨论，但要必须说明的是，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具有巨大的传统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利用藏传佛教首领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巨大政治影响，号令蒙藏各部，并使之牵制蒙藏世俗贵族，巩固、加强封建中央政权和国家的统一，是清朝尊崇和利用藏传佛教的政治目的。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保护、支持下的任何宗教，无有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清帝既作为藏传佛教最大的檀越，自然要让它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清代的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实际上都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着，他们都是清廷用佛教“化导”、“柔顺”蒙藏民族的执行者，使其“倾心向化”，维护清朝的统治。尽管尽忠程度和效力大小各有差异，但其实质是相同的。清帝和藏传佛教领袖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利用的关系，如章嘉活佛“一面为清廷对蒙古、西藏做宣抚工作，一面以其政治上的地位来促成蒙藏两地之宗教之发展”㊴。最后需要重申的是，宗教上层、尤其是像清代的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这样的宗教领袖，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种政治活动符合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是应当充分给予肯定的。相反如果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一切活动，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应坚决予以否定和批判，也势必为历史所唾弃。

① 其事迹可参阅拙文《二世章嘉活佛政治活动述略》，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②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63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③ 妙舟：《蒙藏佛教史》下册，第96页，上海佛学书局，1935年。
④ 雍正：《御制善因寺碑文》，见《口北三厅志》卷首“制敕条”。
⑤《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五。
⑥《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102页。
⑦《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125页。
⑧《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127页。
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184页。
⑩《清史列传》卷十九《傅清传、拉布敦传》
⑪《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211页。
⑫⑬《章嘉国师若比多吉传》第212页。
⑭《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四。
⑮⑯一史馆藏乾隆朝满文录副奏折档，转引于季永海、关精明《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后》一文，载《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
⑰《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233页。
⑱《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235页。
⑲⑳《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267页。
㉑㉒《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295页。
㉓《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七。
㉔《清高宗实录》卷五七八。
㉕见《波格尔使藏记》143页，转引自柳升祺、邓锐龄著《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罗桑贝丹意喜生平事迹述评》一文，载《民族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7年。
㉖《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七二。
㉗军机处满文班禅寄信档，转引自《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86、8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
㉘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87页。
㉙《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346页。
㉚《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347页。
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348页。
㉜《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308—312页。
㉝㉞㉟㊱昭梿：《啸亭杂录》卷十《章嘉喇嘛》。
㊲《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227页。
㊳乾隆朝《东华录》卷四四。
㊴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517页，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